

家庭生命周期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研究^{*}

诸培新 杨 子 饶芳萍

【摘 要】文章从理论上探究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对土地经营规模及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机制,利用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呈“倒 U 形”态势,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明显高于空巢家庭,独居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明显小于空巢家庭。(2)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偏好从转入逐渐变为转出。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转入土地的概率较高,转出概率较低,而独居家庭转入土地的概率较低,转出概率较高。(3)农民城镇化后的社会保障可获得性对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农户应当采取差别化的土地和劳动力配置激励政策,同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关键词】家庭生命周期 农户经济行为 土地流转 规模经营

【作 者】诸培新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 子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饶芳萍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一、引 言

中国农地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决策也以农户为决策主体,农户决策行为深受家庭资源禀赋特征的影响。家庭生命周期是家庭人力资源特征的综合体现,伴随着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质量的变化而演进,影响着家庭的生产生活决策。然而,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土地规模经营的决策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能否解释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差异?现有文献对此尚缺乏充分研究。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政府主导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研究:作用机制与政策调控”(编号:71373128)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有学者在实证和规范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农户特征与土地规模经营之间的关系,但已有研究多将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方程,并未基于家庭综合特征尤其是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探索(许月明,2006;许恒周、郭忠兴,2011;张忠明、钱文荣,2014)。然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由于家庭成员的构成、年龄结构、家庭需求及发展任务等方面的不同,不同农户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决策也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人口学视角探索土地规模经营的变化,考察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决策的影响。在借鉴已有相关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家庭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划分,以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为支撑,试图揭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对土地经营规模变化进行解释。本文通过揭示家庭生命周期与土地规模经营变化的关系,明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经营决策的影响,准确识别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家庭特征,为促进农户流转土地、培育新型农业主体以实现适度经营规模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一) 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理论,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初创时代、扩展时代和修正时代3个阶段。目前,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已较为完整,学者也对家庭生命周期提出了更为精细的划分方法。Wells等(1966)根据户主的年龄、工作情况、婚姻状态及家中最小孩子的年龄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9个阶段。但随着现代社会中离婚、非婚人口的增加及无子女家庭数量的变化,Murphy等(1979)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年轻单身阶段、年轻已婚无子女家庭、其他年轻家庭、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Gilly等(1982)在保留3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女性及其社会地位,按照年龄、成年的家庭成员人数及子女情况3个维度重新划分了家庭生命周期,提出了13阶段模型。

现阶段中国对家庭生命周期分类较为粗略,国外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应用实践性和模型解释力较低,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土地经营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林善浪等(2011)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归类借鉴了Perz(2001)的划分标准,检验了家庭人口特征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但该研究忽视了现阶段中国农业老龄化趋势下土地越来越多地由空巢家庭经营的现实,计量分析中忽略了空巢家庭变量对估计结果准确性的可能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本研究目的,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7个阶段,对应7种家庭类型,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二) 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经济行为

从经济学角度看,家庭生命周期与劳动力供给、家庭收入、消费储蓄等经济行为密切相关,影响了家庭生产、效用及资源配置的变化。已有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表 1 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家庭类型	家庭状态描述
单身家庭	年轻,单身,且未与原生家庭生活在一起
新婚家庭	年轻,结婚成家,无子女
成长的核心家庭	已婚,有子女且最小的子女小于 18 岁
成熟的核心家庭	已婚,成年子女在家且子女未生育
扩大家庭	成年子女在家且子女已生育
空巢家庭	夫妻健在,成年子女离家
独居家庭	夫妻一人去世,独居及其他情况

在以下几个方面:(1)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劳动力。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伴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减,家庭人口负担也在不断变化:从第一个子女出生到成年,家庭人口负担逐渐加重,第一个子女成年到最后子女成年,家庭人口负担逐渐减轻(史清华、侯瑞明,2001)。也有学者考察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发现农民工务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家庭的需求,农户会根据家庭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需求和目标改变个人的就业选择(李强、龙文进,2009)。(2)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经济收入、资产积累有直接的关系,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的经济收入与实力明显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收入的变化呈现出“倒 U 形”关系(Lansing 等,1957)。年轻的家庭经济收入和实力呈增长趋势,随着家庭的生育、人口负担的增加,家庭经济状况处于较低水平,当子女成年,家庭收入达到顶峰,但随着家庭的缩减,经济状况又回到相对较低水平。(3)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储蓄、金融投资的影响。家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因此,在生育、教育和收入转移的决策过程中面临的预算约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会对使家庭的消费结构、偏好和消费模式发生明显转移(郭庆松,1996;李志兰、江林,2014),也影响家庭的储蓄行为(万广华等,2003;杨凌、陈学彬,2006)。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家庭成员在未来获得的收入流存在差异,年轻家庭更多地选择参与股市,而老年家庭以保本稳定型金融工具作为主要选择(周弘,2015)。

通过梳理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不难发现,农户的就业、消费、储蓄等行为受到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的影响,相应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些研究也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三) 家庭生命周期与土地经营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农户的家庭规模、人口结构、就业偏好、资本积累均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行为。最早关注家庭生命周期与土地经营规模的小农理论认为,农户家庭规模和家庭的人口结构是影响农户土地生产规模的重要因素(Ellis,2006)。农户家庭规模影响了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劳动力投入

多,可耕种的土地面积也会相应提高(Clay 等,1992)。家庭人口结构随着家庭生命周期演变而变化,也决定了家庭中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比率,当农户家庭人口负担重,供养比高,农户会更多地投入生产,增加土地面积以获得必要的收入(Perz 等,2001)。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外出务工的决策不同,新生的年轻家庭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而成熟的家庭则倾向于返回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大(白南生、何宇鹏,2002)。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农户的家庭资本积累存在差异,单身及新婚的年轻家庭资本积累较少,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进行规模农业生产的能力不足,而成熟及扩大家庭在资本积累上优于新生家庭,具有良好的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经济基础,因此更有可能进行土地规模经营。

家庭生命周期从单身家庭开始,当个体从原生家庭中分离出来独立门户,成为家庭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单身阶段家庭的经济负担较小,户内仅有1人且年轻力壮。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推动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务工成为大多数单身家庭的就业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单身农户家庭较少,参与土地转入的可能性降低。由于国家土地二轮承包期内不允许调整,该阶段农户经营的土地多从原生家庭中分割出来,因此单身家庭初始经营土地面积较小。在中国农村,该阶段农户多进城务工,他们的土地多由原生家庭耕作,这也减少了单身家庭土地转出的可能性。

新婚家庭由年轻的夫妻组成,年轻夫妻既没有需要抚养的小孩,也没有需要赡养的老人,经济负担虽比单身阶段重,但相对于其他阶段,经济压力仍相对较轻。新组建的家庭资金积累有限,大部分的财产已用于购买家庭耐用品,因此土地规模经营能力较低。由于家庭组建处于二轮承包期内,妻子嫁入夫家后无法获得新的承包土地,只有丈夫能获得部分原生家庭的承包土地,因此新婚家庭的初始土地经营面积也较小。新婚家庭阶段的农户与单身阶段农户年龄相近,就业选择也较为类似,多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少,因此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相对较低,即使有部分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由于资金限制也会减少土地转入的规模。

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是由夫妻二人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处于该阶段的家庭以抚养子女为主要的家庭任务,经济负担较重。由于外出务工的生活成本较大,并且未成年子女异地就学门槛较高,大多数家庭会选择在家养育下一代,或夫妻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在农村原籍,因此该阶段的家庭更倾向于在家务农或兼业。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该阶段的家庭会有部分选择转入土地,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因此该阶段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大。

处于成熟阶段的核心家庭,子女已经成人但未离家。该阶段的家庭纯消费人口为零,家庭经济负担小,因此家庭就业选择具有多样化:刚刚成年的子女倾向于外出打工,较为年长的父母在非农就业市场缺乏优势,但拥有丰富的种田经验,倾向于在家务农。

该阶段的农户家庭是进行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参与者：一是该阶段家庭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并且经济负担小；二是该阶段家庭中父母为 50~60 岁的壮劳力，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成年的子女既可以帮衬家里从事农业生产，非农就业的收入还可以增加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因此，该阶段家庭参与土地转入的概率较高，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大。

处于扩大阶段的家庭规模较大，为三代同堂型，家中既有未成年人也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人口供养比较高，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在农村，该阶段的家庭较为常见的情况是中年夫妻外出打工，父母在家务农，承担抚养未成年孙子女的任务。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结婚成家的平均年龄较低，因此该阶段的父母大多处于 55~65 岁，身体条件尚好，加之具有丰富的种田经验，多会选择转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该阶段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较多，土地经营规模较大。

空巢家庭阶段，当子女成年离家，年老夫妻单独居住。此阶段的夫妻已进入老年，劳动能力逐步下降，很难维持重体力劳动，养老成为家庭的主要目标，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决策更多为维持现状或转出土地，难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独居阶段，夫妻一方去世，家庭以适应老年社会、享受退休生活为主，对土地规模经营的选择更为单一，加之年老体弱，土地经营规模相应减小。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家庭规模、年龄结构及家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的人数都是影响土地规模经营的家庭人口因素。其中，家庭规模影响了土地初始分配的数量；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度量了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劳动力、老年人的数量，影响家庭供养比和劳动能力；家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的人数和就业能力决定了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部门的配置，影响家庭农业生产的偏好和土地经营规模的决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验证土地经营规模是否存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关键是要考察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能否对土地经营规模变化做出有效解释。家庭生命周期是复合变量，综合度量了家庭规模、年龄结构、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晁钢令、万广圣，2016），本文借鉴于洪彦、刘艳彬（2007）的方法，将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作为关键变量，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为因变量，选取影响土地规模经营的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为控制变量，考察家庭生命周期对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影响，建立土地经营规模回归模型为：

$$Land_i = \alpha + \beta_k FLC_k + \gamma_i x_i + \varepsilon_i \tag{1}$$

其中， $Land_i$ 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 FLC_k 为家庭生命周期阶段（ $1 \leq k \leq 7$ ），当家庭处于阶段 k 时取值为 1，其他情况取值为 0， x_i 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变量

及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α 为模型的常数项, β_k 为对应家庭生命周期阶段 FLC_k 的回归系数, γ_i 为对应控制变量 x_i 的回归系数, ε_i 为模型的残差项。

为了进一步理解土地经营规模的生命周期效应的形成机理,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经营决策(即转入和转出)的影响, 并建立土地经营决策选择模型, 具体公式为:

$$P(Rent_i=1)=\Phi(\alpha+\beta_k FLC_k+\gamma_i x_i+\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Rent_i=1$ 表示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转入或转出), $Rent_i=0$ 表示农户未参与土地流转, 通过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

(二) 变量说明及数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农村住户调查部分。数据样本涵盖了从 14 个省份抽选出的 10 490 户农村住户样本, 包含 39 065 个个体信息, 抽样对象均为拥有本地农业户籍的人口。以下将对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进行简单说明, 并给出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的关键变量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是一个复合变量, 在研究中首先对农户家庭状态的众多变量如户主年龄、婚姻状态, 最大子女及最小子女年龄等进行测量, 然后根据这些家庭基本状态信息, 对农户家庭生命周期阶段进行编码, 产生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表 2 给出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样本农户的家庭特征^①。不难看出, 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平均家庭规模、平均劳动力人数、外出劳动力人数呈“倒 U 形”趋势。扩大家庭的人口规模最大, 为 4.92 人, 成熟的核心家庭劳动力人数最多, 为 3.41 人。外出劳动力人数指标反映了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情况, 成熟的核心家庭平均外出劳动力人数为 1.05 人, 明显高于其他阶段。再关注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平均土地规模, 可以发现家庭平均土地规模较小, 均值为每户 6.17 亩。另外, 各个家庭生命周期的平均土地规模也呈“倒 U 形”趋势, 扩大家庭的土地规模最大, 为 6.84 亩, 成长的核心家庭和成熟的核心家庭土地规模也在平均值水平上下, 而单身和独居家庭的规模较小, 均小于 3 亩。新婚家庭、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及扩大家庭的平均转入土地面积较高, 其中成长中的核心家庭平均土地转入面积高于其他阶段, 为 11.82 亩。空巢家庭和独居家庭的平均转入面积较小, 仅为成长中核心家庭转入面积的 1/3。各个家庭阶段的平均土地转出面积较为相似, 其中扩大家庭、单身家庭和新婚家庭的平均土地转出面积较大。

土地经营规模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 $Land_i$ 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 土地经营决策模型的因变量为是否进行土地转入、是否进行土地转出。模型的控制变量 x_i 包括户主个体

^① 由于单身家庭在数据样本中所占比重较小, 且在中国农村单身未与父母居住的情况并不多见, 因此, 本文的单身家庭未进入实证模型。

表 2 家庭生命周期的样本构成

家庭类型	样本户数 (户)	比重 (%)	家庭规模 (人)	劳动力 (人)	外出劳动力 (人)	土地规模 (亩)	转入面积 (亩)	转出面积 (亩)
单身家庭	145	1.38	1.00	1.00	0.13	2.59	4.13	3.23
新婚家庭	936	8.92	2.00	1.77	0.19	5.71	7.48	3.24
成长的核心家庭	2614	24.92	3.73	2.43	0.60	6.63	11.82	2.54
成熟的核心家庭	1992	18.99	3.41	3.41	1.05	6.12	7.19	3.05
扩大家庭	3809	36.31	4.92	2.96	0.97	6.84	7.19	3.30
空巢家庭	752	7.17	2.00	0.00	0.00	4.15	3.65	2.87
独居家庭	242	2.31	1.00	0.00	0.00	1.31	2.33	2.42
合 计	10490	100.00	3.72	2.50	0.72	6.17	8.48	3.00

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是党员或村干部、身体健康状况)及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外出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比重、家庭总收入、家庭农业固定资产、非农就业稳定性、是否参与专业合作社)。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4 回归结果显示各个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变量的系数显著,表明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土地经营行为也发生相应变化,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有较好的解释力:

一方面,回归方程中的常量(空巢家庭)捕捉到了对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他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变化也有显著的影响。

新婚家庭土地转出的概率在 10%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表明新婚

表 3 控制变量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土地经营规模(亩)	6.17	13.74	0.00	448.50
土地转入(有 =1;没有 =0)	0.11	0.32	0.00	1.00
土地转出(有 =1;没有 =0)	0.15	0.36	0.00	1.00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岁)	51.88	11.53	12.00	97.00
受教育年限(年)	6.97	2.91	0.00	20.00
健康程度(好 =1;不好 =0)	0.24	0.43	0.00	1.00
党员(是 =1;不是 =0)	0.11	0.31	0.00	1.00
村干部(是 =1;不是 =0)	0.06	0.23	0.00	1.00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收入对数	10.31	0.80	6.22	14.14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对数	3.89	4.21	0.00	15.90
外出劳动力占户内劳动力人数的比重(%)	0.25	0.31	0.00	1.00
有城市医保家庭成员比重(%)	0.09	0.24	0.00	1.00
有城市养老保障家庭成员比重(%)	0.09	0.23	0.00	1.00
参加农业专业合作社(参加 =1;未参加 =0)	0.03	0.18	0.00	1.00

表 4 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土地经营规模	土地转入	土地转出	稳健性检验
常数项(空巢家庭)	-5.650 ^{**} (2.730)			-5.725 ^{**} (2.443)
新婚家庭	0.935(0.718)	0.029(0.017)	-0.046 [*] (0.019)	0.932(0.681)
成长的核心家庭	2.089 [*] (0.836)	0.037 [*] (0.018)	-0.060 ^{**} (0.019)	2.095 ^{**} (0.710)
成熟的核心家庭	1.569 [*] (0.751)	0.036 [*] (0.017)	-0.075 ^{***} (0.018)	1.557 [*] (0.665)
扩大家庭	2.347 ^{**} (0.776)	0.033 [*] (0.015)	-0.064 ^{***} (0.016)	2.333 ^{***} (0.612)
独居家庭	-1.701 ^{**} (0.632)	-0.146 ^{**} (0.053)	0.028(0.024)	-1.716(0.987)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	-0.004(0.013)	0.001(0.000)	0.000(0.000)	-0.003(0.016)
受教育年限	-0.199 ^{***} (0.051)	-0.002(0.001)	0.003 [*] (0.001)	-0.199 ^{***} (0.052)
健康程度	0.334(0.289)	0.009(0.007)	-0.011(0.009)	0.331(0.311)
党员	0.793(0.540)	-0.002(0.011)	0.003(0.013)	0.790(0.456)
村干部	1.632 [*] (0.819)	0.027 [*] (0.013)	-0.000(0.017)	1.636 ^{**} (0.616)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收入	0.785 ^{**} (0.248)	0.017 ^{***} (0.005)	0.031 ^{***} (0.006)	0.791 ^{***} (0.197)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	0.758 ^{***} (0.042)	0.010 ^{***} (0.001)	-0.011 ^{***} (0.001)	0.761 ^{***} (0.033)
外出劳动力比重	-3.006 ^{***} (0.375)	-0.035 ^{**} (0.011)	0.069 ^{***} (0.012)	-3.007 ^{***} (0.442)
有城市医保家庭成员比重	-2.702 ^{**} (1.005)	-0.096 ^{***} (0.025)	-0.011(0.019)	-2.693 ^{***} (0.725)
有城市养老保障家庭成员比重	-0.159(1.707)	-0.047 [*] (0.023)	-0.008(0.020)	-0.181(0.784)
参加农业专业合作社	0.456(0.605)	0.055 ^{***} (0.015)	0.015(0.021)	0.426(0.717)
R ² (Pseudo R ²)	0.124	0.087	0.057	0.124
F-value	57.41			50.29
VIF(mean)	2.58			
LR chi2(29)		569.17	461.77	
Observations	10345	8755	9173	10345

注：地区虚拟变量已控制。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土地转入、土地转出给出的为边际效应。*p<0.1, **p<0.05, ***p<0.01。

家庭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较低。新婚家庭土地经营规模的回归系数及转入土地概率均为正,但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新婚夫妻从原生家庭中分割出来,最多只有男性能分配到原来的承包土地;二是由于新婚夫妻刚组建家庭,家庭的资金积累较少,能够转入的土地面积有限。这两个原因造成新婚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决策在统计上不显著。

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有较为相似的家庭特征,家庭规模较大,劳动力较多,因此,3个阶段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这3个阶段的家庭土地经营规模显著高于对照组(空巢家庭),土地转入概率为正,土地转出概率为负。3个阶段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的系数大小有所差异,系数大小关系为:扩大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系数>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这是由于扩大家庭中既有

需要抚养的子女,也有需要赡养的老人,虽然劳动力外出务工能获得更多的家庭收入,但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较高,大多数扩大家庭会选择在农村生活。一方面较大的家庭规模原有的承包地较多,另一方面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能够承担更多的农业生产,从而土地经营规模较大。成长的核心家庭与扩大家庭的区别在于,成长的核心家庭没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但同样需要抚养子女,因此土地规模经营的选择也与扩大家庭类似。成熟的核心家庭中没有纯消费人口,家户内成员均在劳动年龄,该阶段的家庭就业选择更为多样化,年轻已成年的子女能够外出务工,仅有部分年长的夫妻在农村务农,因此土地经营规模较小。独居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土地转入概率显著为负,这表明独居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小,也不会选择转入土地,与预期相符。土地经营规模回归模型中的常量表示的是作为参照组的空巢家庭,空巢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系数显著为负,也与预期相符。其余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及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也基本符合理论预期(见表 4)。

为了增加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多重共线性诊断。对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计算,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最大的 VIF 值小于 10,均在合理范围内,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二是 GLS 稳健性估计。对模型使用 GLS 方法进行估计,与 OLS 的估计量进行比对,表 4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两种估计方法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模型中部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有显著提升。由此可见,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稳定性。

从上述结果看,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庭对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明晰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按照前述的数据处理方法,分别建立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及扩大家庭 3 组土地经营规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估计结果表明,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受教育年限、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外出劳动力比重对 3 个阶段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方向相同。户主为村干部对成熟的核心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成长的核心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成熟核心家庭及扩大家庭影响不显著。代表农户城镇化的社会保障可获性的两个变量(拥有城市医保的家庭成员比重、拥有城市养老保障的家庭成员比重)对成长中的核心家庭及成熟的核心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扩大家庭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索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决策行为,为精准识别农户层面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制约因素和有较好潜力的新型经营主体家庭特征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有显著影响,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随着

表 5 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参数估计结果

变 量	成长的核心家庭	成熟的核心家庭	扩大家庭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	0.064(0.048)	-0.001(0.032)	-0.008(0.014)
受教育年限	-0.298*(0.178)	-0.136*(0.073)	-0.148**(0.061)
健康程度	0.003(0.706)	0.451(0.423)	0.483(0.421)
党员	0.600(1.106)	0.511(0.838)	0.346(0.600)
村干部	2.850(3.127)	3.019*** (1.114)	1.405(1.075)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收入	1.241*(0.737)	0.243(0.311)	0.418(0.323)
家庭农业固定资产	0.987*** (0.105)	0.683*** (0.0545)	0.760*** (0.070)
外出劳动力比重	-3.756*** (0.763)	-1.958*** (0.580)	-2.503*** (0.574)
有城市医保家庭成员比重	-1.689*(1.002)	-1.039(0.810)	-4.436(2.811)
有城市养老保障家庭成员比重	-1.041(2.574)	-2.321*** (0.840)	3.462(5.228)
参加农业专业合作社	-0.531(1.695)	0.611(0.905)	0.792(1.082)
常数项	-10.53(8.626)	2.101(4.110)	-1.829(3.518)
F-value	20.56	21.49	31.95
R ²	0.110	0.222	0.164
Observations	2614	1992	3809

注：地区虚拟变量已控制。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p<0.1,**p<0.05,***p<0.01。

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呈“倒U形”态势，其中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显著高于空巢家庭，独居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显著小于空巢家庭。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土

地流转决策有显著差异，随着家庭生命周期演变，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偏好从转入逐渐变为转出，具体为新婚家庭、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转入土地的概率较高，而独居家庭转入土地的概率较低。除家庭生命周期外，其他因素对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及扩大家庭的土地规模经营决策影响有明显差异，其中家庭收入和有城市医保家庭成员比重对成长的核心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影响显著，村干部和有城市养老保障家庭成员比重对成熟的核心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影响显著。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说明土地规模经营决策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应当采取差别化的策略。首先，对空巢家庭、独居家庭而言，政府应给予养老保障支持，鼓励其转出土地。其次，顺应不同生命周期家庭中土地经营决策和劳动力就业意愿差异，为农户职业分化、稳定城镇化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和社会保障，推进有非农就业愿望和基本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有序转移，促进其土地转出。第三，从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间期的家庭中发现和培养职业农民，促进其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处于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阶段的劳动力更有条件成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政府可通过培训提升这些农户的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为适度土地规模经营提供有竞争力的经营主体。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何宇鹏(2002):《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2. 晁钢令、万广圣(2016):《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管理世界》,第11期。
3. 郭庆松(1996):《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第2期。
4. 李强、龙文进(2009):《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5. 李志兰、江林(2014):《家庭生命周期对我国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第2期。
6. 林善浪等(2011):《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数据》,《财贸研究》,第4期。
7. 史清华、侯瑞明(2001):《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及其经济运行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第2期。
8. 万广华等(2003):《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5期。
9. 许恒周、郭忠兴(2011):《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3期。
10. 许月明(2006):《土地规模经营制约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
11. 杨凌、陈学彬(2006):《我国居民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行为动态模拟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2. 于洪彦、刘艳彬(2007):《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管理科学》,第6期。
13. 张忠明、钱文荣(2014):《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14. 周弘(2015):《需求层级结构与金融市场参与:家庭金融行为存在生命周期效应吗——基于中国家庭的经验分析》,《财贸研究》,第4期。
15. Ellis F.(2006):《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6. Clay D.C., Johnson N.E.(1992), Size of Farm or Size of Family: Which Comes First?. *Population Studies*. 46(3):491-505.
17. Gilly M.C., Enis B.M.(1982), Recycling the Family Life Cycle: A Proposal for Redefinition.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9):271-276.
18. Lansing J.B., Kish L.(1957), Family Life Cycle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5):512.
19. Murphy P.E., Staples W.A.(1979), A Modernized Family Life Cycl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6(1):12-22.
20. Perz S.G.(2001), Household Demographic Factors as Life Cycle Determinants of Land Use in the Amazon.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3):159-186.
21. Wells W.D., Gubar, G.(1966), Life Cycle Concept in Marke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4):355-363.

(责任编辑:朱 萍)